

# 超越全球城市治理和 “指挥与控制”的迷思

□ [英]理查德·G·史密斯  
路昕 译 翁士洪 译校

**摘要:**本文提出,全球经济受到“指挥与控制”的观点缺乏有信服力的经验实证,是因为它受到新马克思主义迷思的影响。首先,全球经济被假定具有“战略性场所”的主要城市“指挥与控制”,从而实现服从于“高度集中的指挥”,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新马克思主义的几位思潮者。他们论述了全球经济的根源,并且提出了“这一命题缺乏实证是先行者将资本结构化的结果”,从而提出了“全球经济是服从于掌控且可通过远程协调”的假设。其次,泰勒的“连锁世界城市网络”模型被证明是谬误的: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与控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构主义观点,其缺乏可信的论据来支持“指挥中心”的存在。最后,本文通过将相关假设与金融社会学中的人类学研究对照,提出从社会-技术集合体和多样体的角度来理解城市,从而超越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与控制”等一系列毫无现实依据的假定。

**关键词:**全球城市;支配;控制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8)02-0093-011

DOI:10.15944/j.cnki.33-1010/d.2018.02.012

## 一、绪 论

为什么全球城市的概念会流行并获得广泛认可,并成为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似乎站得住脚的路径,这对于研究全球化中的城市的学者来说是个有趣且至关重要的问题。世界经济服从于大城市

的控制和协调这一想法,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核心概念,出现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政治经济环境。那时,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利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原教主义”和“唯全球资本主义是从”的新自由主义民主形式分别在英国和美国替代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民主安排。一系列金钱导向的意识形态——诸如“创造财

收稿日期:2018-01-31

**作者简介:**理查德·G·史密斯(Richard G.Smith) 英国斯旺西大学城市理论研究中心的教授,是城市治理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的研究聚焦于城市研究中的后结构主义、组合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等方面。他在后结构主义理论方面的专长使得他能够重塑城市研究的概念体系和实证方法,以有效批判和推翻新马克思主义世界城市、全球城市、连锁世界城市网络和后殖民主义城市等概念中的错误观念。他的最新研究涉及贫民窟治理、“英国脱欧之后的伦敦”,以及城市研究方法;路昕,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政治研究生院博士生;翁士洪,同济大学副教授、博士。原文载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38.1, Jan 2014, pp98-115.

富”、自私的超级个人主义(hyper-individualism)、私有化、金融化、电脑化、自由化、去国家化、减少管制、自由贸易 和市场力量的“看不见的手”——将这种转变合理化。这些举措使得两国经济在产业和地理上发生倾斜:产业上向金融和全球化服务倾斜,地理上这些产业越发集中于伦敦和纽约的市中心/都市区。换言之,新自由主义的“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已经到来,而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概念又恰巧满足了新马克思主义对世界金融中心(当时以纽约、伦敦、东京为代表)的批判需求。金融中心被认为是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控制中心,恰好代表了资本主义不均衡和极化发展的最终阶段。

笔者在本文中提出,这种看待全球化中城市的思路,以及将某类城市角色和功能看作控制、协调、“指挥”世界经济的终极场所的想法,是错误的。文章通过三部分来论证这个观点。首先,笔者讨论了全球城市概念及其从 Hymer(1972), Cohen(1981)和 Friedman(1986)到 Sassen(1991)的新马克思主义渊源,详细说明了全球城市概念所称的“指挥”这一生产性功能被普遍承认缺乏证据支撑,这是因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将世界经济视为结构整体,并假定需要某种战略性城市来控制。然后,笔者讨论了 Taylor 通过互连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INM)建构的“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①中的连续体谬误(sorites paradox),并借此揭示出一个更深层、更根本的问题。虽然 Taylor 声称自己的模型是对 Sassen 的延伸,然而其技术细节②与全球城市的概

念根本相悖,而且并未提供网络中存在权威中心(即全球“指挥”中心)的实证支撑。事实上,这也是第一次论证了 Taylor 作为 Hymer(1972)和 Friedmann(1986)的理论继承者广泛采用他们的 INM 理论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全球化”的终结,因为正是这种极度结构主义,“全球城市”将不存在。对于关系的过分强调使概念(城市或“节点”)遭到弱化,城市被简化为无地方性(placeless)的“容器”,里面装着各自独立且互不相关的服务业公司。最后,文章跳出新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结构网络等名号,将社会金融学(social studies of finance, SSF)的实证论据,和 Sassen(1991)的“指挥”假设(即全球城市是“高度聚合”的产生“指挥和控制”的场所)以及 Taylor(2004a)的理论(即一个互连的“世界城市网络”,“指挥和控制”是网络本身的结构效果)并列检视,并提出 SSF 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社会-技术集合体(social-technical assemblage)和事件多样性体(eventful multiplicity)的金融中心。

## 二、重读全球城市概念

全球城市概念及其“指挥”世界经济的“一类新型城市”的提法③是如何在新马克思主义中蔚然成风的?其实,某些城市作为全球化分布的经济活动的“高度聚合的指挥”中心这一观点有其特定渊源④,它起始于 Hymer(1972)⑤,这比如今大多数学者所以为的要早几年,比如 Newman 和 Thornley 在讨论“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研究的起源时就写到“当今这场讨论通常被认为始于

- ① “世界城市网络”之所以被加了引号,并非因其是一个推想出的由相对较少的高端生产者企业组成的网络(参考 Robinson 2005 对 Taylor 的概念的批判),而是因为“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城市作为“社会交往和主体化的紧密且短暂的网络”(Thrift, 1993: 235)和社会-技术集合体和多样性体,其角色远不止是无地方性的“容器”,而不同的商务服务企业在各“节点”(即城市)内部和之间完全没有交互,在这个程度上城市的角色已经消失。
- ② Smith 和 Doel(2011)曾简要指出 Sassen 和 Taylor 对“指挥”的处理方法的互斥性难题——独立的公司之间的(Sassen)/相互依赖的公司内部的(Taylor)——让很多全球城市研究陷于理论上的不确定状态。本文旨在通过充分说明,提炼出这一严肃观察的意义,并表明 Sassen(1991; 2001)和 Taylor(2004)的理论相互兼容的看法实际上是一个迷思,这预示了全球城市概念、互连“世界城市网络”模型和所有认为全球经济受到“指挥”的观点的黄昏。笔者有必要在开始就提醒读者们,本文聚焦于全球城市概念和互连“世界城市网络”中“指挥与控制”的迷思并非随意而为(笔者没有去随意讨论 Sassen(1991; 2001)和 Taylor(2004)书中其他相关问题,如就业与收入、临时和非正式就业市场、社会两极分化、跨国民主、世界体系中的荷兰霸权等)。笔者的论点是 Sassen 和 Taylor 的概念的成败都取决于“指挥与控制”这一关键假定。推翻这一假定将从根本上削弱二人的理论在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中被赋予的意义和重要性。
- ③ 萨森(1991: 4)指出有三座龙头城市“如今领先的案例有纽约、伦敦、和东京”。
- ④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91: 3.
- ⑤ Hymer S.,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J. Bhagwati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Macmillan, London, 1972.

Friedmann 和 Wolff 所做的一项研究议程”。弄清楚全球城市概念有着更久远的新马克思主义背景,这至关重要,将有助于理解其“指挥”假设,并理解为什么它和 Taylor 的 INM 及“世界城市网络”中“指挥中心”的假设大相径庭,虽然二者因共同关注高端生产者服务业而看上去相似。

人们向来认为世界经济是通过某些特定城市得以运转(Braudel, 1984; Hall, 1998)——世界都市中的无冕之王有罗马、君士坦丁堡、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等。Hall (1966) 沿袭 Geddes (1915) 将“世界城市”<sup>①</sup>定义为“若干伟大的城市,全世界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大多发生于此”。Hall 由此预言,“全球经济生活将集中在少数重要的信息中心”<sup>②</sup>,即伦敦、巴黎、兰斯台德(荷兰)、莱茵-鲁尔区、莫斯科、纽约和东京。不过,某些城市在控制世界经济中扮演“战略性角色”这一理念相对较新,它可被追述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几位学者,他们率先理论化分析了为何多国公司和公司服务业总部正在不成比例地向少数重要城市聚集这一新兴现象可能对整体经济结构的功能性带来深远影响。其中,代表性人物有 Hymer (1972), Cohen (1981) 和 Friedmann (1986; 与 Wolff, 1982)。他们全都聚焦于作为世界经济控制场所的城市中的多国公司(MNCs)。不过, Sassen 和 Taylor 理论最直接的起源是 Cohen, 因为他不仅将城市看作公司总部的中心,还是国际银行业和战略性公司服务业的中心。“只有存在范围广泛的国际商业机构的地方才能被称作真正的世界城市”<sup>③</sup>。Hymer 的贡献是提出了多国公司内部控制的集中与国际经济控制的集中之间的对应原则。他提出,多国公司的兴起带来了公司高层决策向少数关键城市集中的趋势,这样,

“世界的主要城市……将成为高层战略规划的主要中心”。<sup>④</sup>由此,可以预见到一个形成中的城市等级体系,“高层决策工作向少数发达国家的“关键城市”集中,“周围环绕着一些区域次级中心”,而世界其他地区只能获得“低层级的活动和收入”。总地来说,其基本模式建立在“依附关系”和“上级与附属,总部与分支工厂”的区分上。简言之, Hymer 是勾勒出“全球”城市等级体系的第一人,他预见国际经济的集中控制只存在于某些特定城市。所以,他的文章为之后所有假定世界经济受到某种方式的控制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原本。Cohen (1981) 随后发展了 Hymer (1972) 的理论。他认为,“全球城市扮演新国际体系中公司控制和协调中心的角色”。重要的是, Cohen 将 Hymer 对于城市中多国公司的关注扩展到公司对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他“将这些新需求……与一批全球城市的崛起联系起来”,这些城市“充当了国际性商业决策和公司战略规划的中心”。因此, Cohen 为日后的 Sassen (1991) 开辟了道路,因为他辨识出公司服务业和其他关键性国际功能向少数城市集聚的现象,而 Sassen 在其全球城市概念中就着重强调了高端生产者服务业<sup>⑤</sup>,而不是多国公司。Cohen 也首次提出,要想衡量一座城市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重要性,“必须先弄清这座城市是否是国际银行业和战略性公司服务业的有力中心”。<sup>⑥</sup>但是,对于全球城市研究范式的形成同样重要的是, Cohen 还将他的论点进行了扩展。他提出,“(全球城市)正成为协调和控制新国际分工的城市”,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是 Cohen 首先使用新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控制原则看待世界经济,后来的 Friedmann (1986), Sassen (1991) 和 Taylor (2004a) 均受

① “世界城市”这一提法可追溯至歌德(Sassen 2001: xix)。另外, Lefebvre (2003: 169) 曾提到,“全球城市”的提法“通常被认为来自毛泽东主义(Maoism),也许就是毛泽东本人”。Lefebvre 在其 1970 年著作中发展了这一理念,将全球城市描述为“权力中心”,“其作为决策中心,并不总是与(一国的)首都重合”(同上: 170; 参见 N. Smith 2003: xx 中的错误)。所以,认为“全球城市”概念由 Sassen 首先创造出来是一个常见的错误认知(如,参见 Robinson 2002: 535 中的错误)。

② Hall P., *The World Cities*.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London, 1966: 240.

③ Cohen R.B.,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rban Hierarchy*. In M. Dear and A. Scott (Ed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Methuen, London, UK, 1981: 302.

④ Hymer S.,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J. Bhagwati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Macmillan, London, 1972: 124.

⑤ Sassen (1991) 也参考了当时涌现出的由经济地理学者(如 Peter Daniels) 和经济学者(如 Thomas Stanback) 对公司服务业做的分析。

⑥ Cohen R.B.,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rban Hierarchy*. In M. Dear and A. Scott (Ed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Methuen, London, UK, 1981: 302.

到这一超前的研究手法的影响。

虽然 Cohen 是受 Palloix(1975) 的启发才去思考世界城市的等级体系——Cohen 将 Hall(1966) 所列的七座世界城市减少到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座支配性城市,但 Cohen 首要聚焦于界定美国城市系统的新等级结构。他认为,通过“将决策行为从国家或区域中心抽离”,新国际分工促进了“国际公司决策和公司服务业”向若干美国城市集中的趋势(纽约和旧金山是唯一被 Cohen 界定为世界城市的美国城市)。对 Cohen 理论的扩展是由 Friedmann 完成的,他的观点是我们可以有全球控制力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来理解一些城市的相对经济力量。

“通过将体系视为一个整体”,Friedmann 和 Wolff 明确地试图建立一项研究和行动议程,其基本假定是世界中的支配性城市(指“集聚了世界大部分活跃资本的”极少数城市)对于“必须作为整体来看待”的世界经济系统的形成越发不可或缺。Friedmann 和 Wolff 主张,资本赋予城市支配空间——“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的控制中心”;在每个阶段跨国资本只会将控制力赋予这些城市中的少数几座;离开了这些“世界”城市,“涵盖全球的经济系统将难以想象”。世界城市“研究路径”的这些原理让 Friedmann 和 Wolff 得以推想资本主义世界中,可能存在世界城市和全球影响与控制的等级体系。果然,四年以后,Friedmann(1986) 延续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创的“半边缘地带”概念,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的等级体系”论,将三十座世界城市划分为首要(primary) 或次要(sec-

ondary) 以及它们是以支配性内部结构处于世界经济的核心区,还是以半支配性内部结构处于半边缘区。<sup>①</sup>

正是从这个既有的新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认识框架(即“世界城市最固有特性是其全球控制功能”)出发,<sup>②</sup>Sassen(1991) 提出了其全球城市的概念和“重要城市的新战略角色”。在这一经多年实证研究汇聚的新马克思主义巨著中,她设想了一个多节点的世界经济系统,其中纽约、伦敦和东京作为领先的全球城市“指挥”着全球化(而非城市化)进程从北美、西欧和亚洲三大中心的扩散<sup>③</sup>。Sassen 认为,全球城市如今的功能包括“金融中心和全球服务与管理中心”,它们同时具有两种特质(作为金融业和专业服务公司的关键位置…作为这些先进行业中创新等活动的生产场所;…以及作为产品和创新成果的市场),并且在城市内部特定的公司间地理关系,即相邻的竞争性公司间为跨国客户“联合生产”互补性服务的“新型聚集力”(new dynamic of agglomeration):

高端服务业多为生产者服务业;与其他种类服务业不同,它们并不依靠与客户近距离布局。这些专业化公司得益于,并且需要靠近关键性投入的生产商或因为空间接近而可能联合生产某种服务的其他公司。会计公司可以在千里之外提供服务,但其服务的性质需要它靠近其他专业人士,比如律师或程序员。今天,典型的大公司交易需要法律、会计、金融、公关、管理咨询等多种专业公司的同时参与<sup>④</sup>。

① 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1 ,1986: 69-83.

② King A.D. ,Global Cities: Postimperi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ondon ,Routledge ,London ,1991: 25.

③ Sassen 沿袭 Cohen(1981) ——也引用过(1991: 359 和 1988: 205) ——在 1984 年第一次选择使用“全球城市”的术语(Sassen 2001: xix; 同样参见 Sassen 1988) ,不过,其实在她和 Cohen(1981) 之前,Heenan 就已经使用过这一术语,他明确写道“本文聚焦全球城市这一新兴现象”(Heenan 1977: 81)。他领先 Cohen 若干年将全球城市的崛起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总体来说,全球城市生成于世界工业体系中的根本性改变”(同上: 82)。Heenan 文章的前瞻性更体现在,他提出多国公司的全球化和区域组织正“产生对于全球城市的需求”(同上,引用者强调)。Heenan 将全球城市的兴起视为多国公司在区域基础上自我整合的必然需要:全球城市是一种系统需求。Heenan 总论点的要旨是多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组织结构变化:如今,一些城市需要成为“知识导向的指挥所”(同上),展现出全球和区域领导能力。其实,Heenan(1972) 先于 Sassen 将城市视为“指挥”中心——通过城市“指挥”经济的观点没有出现在 Hymer(1972)、Cohen(1981) 和 Friedmann(1986; Friedmann & Wolff ,1982) 的论述中。然而,由于城市研究的大讨论被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主导了,Heenan 从商业研究角度所写的文章被认为“没能考虑到世界体系和‘全球城市’间的辩证关系”(Friedmann & Wolff 1982: 332),是“肤浅的”,所以被忽视了。这导致 Heenan 的文章几乎再也没有被全球/世界城市研究引用过(参考 Beaverstock et al. 1999; Hall(2001) 对 Beaverstock、Smith 和 Taylor 研究的评论)。由于没能通过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测试,Heenan 的名字从这一研究领域的综述(比如 Alger 1990; Yeoh 1999; Knox & Taylor 1995; Smith 2000; Brenner & Keil 2006) 中消失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才开始(重新) 出现于核心论述中(参见 Taylor et al. 2013)。

④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91.

简言之,全球城市凭借其作为金融和专业生产者服务业的关键场所,在世界经济的组织中享有作为“高度聚合的指挥点”的中心地位。这不仅因为它们既是这些先进行业的创新地也是创新产品的市场;同时也因为,这些金融和专业生产者服务业需要相互靠近且互补,来为MNC客户“联合生产”服务,这至关重要。<sup>①</sup>

Sassen试图通过“强调全球城市作为产生指挥与控制功能的生产和销售地的角色”将她的全球城市概念与新马克思主义中已有的对“世界城市”(Friedmann,1986)和“全球城市”(Cohen,1981)的研究区分开来。但是Thrift敏锐地观察到,Sassen的这一后韦伯主义尝试并没有充足的说服力,原因有三。

其一、她的理论词汇仍然“涉及‘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和‘指挥与控制’”。其二、她所称“扮演新战略角色”的主要城市“仍然只是那些处于国家公司和跨国银行的正式公司等级结构顶端的城市”。其三、她“未能充分解释,为何在去中心化的世界中,这种场所和市场在空间上的聚集是必要的”。所以,正如Smith后来提到的,Sassen“将全球城市作为后工业化服务业和金融产品的集聚化生产场所”来思考,“而Sassen正是在这一点上,摒弃了一个适合评估权力和代理人的话语空间,而转而选择一套以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结构-功能逻辑所限定的语言”。<sup>②</sup> Smith还进一步解释:

毫无疑问,她是有意为之。用她的话说,“我意图将关注焦点从人们熟知的对象移开,譬如大公司对政府和经济的影响力,或通过IMF等相互关联的董事会或组织在超越公司层面的力量聚集……我关注的不是权力,而是生产:是那些作为全

球控制能力输入的生产过程,以及参与生产的各种工作的基础支撑”<sup>③</sup>。

所以,Sassen是在这种后韦伯主义(关注生产,而非权力)的层面上不同于Friedmann,这也是为什么日后Taylor(2001;2004a)的研究与Sassen(1991)的直接相左,<sup>④</sup>因为Taylor明确地将Friedmann(1978,1986)对城市系统中存在权力的空间组织的论述视为给定条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互联“世界城市网络”中“全球指挥中心”的权力的概念。<sup>⑤</sup>

总的来看,全球城市概念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假设,两者都来自后韦伯主义中将全球控制力看作生产出的而非既有的这一做法,因此我们不妨说其有效性是建立在两个虚构的基础上:其一是虚构了各城市内部,相邻的服务业公司间通过互动将服务“打包”(即联合生产)提供给跨国企业客户;其二是虚构地将这种活动等同于全球经济的“高度聚合的指挥”,而不再只是其地理管理的一个方面而已。<sup>⑥</sup>虽然今天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城市和都会区中的组团、集聚和密度——而不仅仅是资本、劳动力和土地——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可Sassen的论点却十分不同,因为她的全球城市概念根本上谈的是“聚合化指挥”和城市的“战略角色”,而非经济成长本身。<sup>⑦</sup>公司之间是否真的合作并“通过可能的联合生产提供某些服务”(Sassen,1991:11)?还是说它们只是单纯地互相买卖对方的服务?而那又是否真正构成对全球经济的“指挥”?即便在外行眼里,答案都是高度存疑的,尤其是次贷危机(2008至今)爆发后,伦敦和纽约被广泛描绘为已然失控的“赌窝”或

① 这就是为什么,为强调Sassen假设的不仅仅是“联合生产”,Smith和Doel(2011:3)将这一关键假设称为“打包化互补”(packaged complementarity)。

② Smith M.P.,*Transnational Urbanism: Locating Globalization*,Blackwell,Oxford 2001:55.

③ Smith M.P.,*Transnational Urbanism: Locating Globalization*,Blackwell,Oxford 2001:55.

④ 注意Taylor(2004a:87)对Sassen(1991)的明显误解。

⑤ Sassen和Taylor的概念间存在明显断层,可学者们仍错误地认为二者相互兼容(参见如Pereira & Derudder 2010; Neal 2011)。错误源于他们只将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理解为一个横跨并联系两人研究的主题。换句话说,他们忽视了Sassen(1991)在其全球城市概念(即公司间“联合生产”网络)中所做的后韦伯主义尝试与Taylor的互联“世界城市网络”之间的显著差别。Taylor的模型虽然关注公司服务业而非跨国公司,本质上却是与Friedmann(1986)和Hymer(1972)对支配和从属性办公网络(公司内网络)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一脉相承的。

⑥ Pamreiter(2010)试图将全球城市的功能分为管理世界经济和“指挥及控制”,并发现没有充分证据说明墨西哥城有后一种功能。

⑦ 比如城市经济学家Kennedy(2011:4;他对集聚的论点,见115-16)就明确地将自己的路径与Friedmann和Sassen做了对比。

“赌场”(参见 Zaloom, 2010a)。<sup>①</sup>事实上,全球城市概念的甲壳从未被揭开,接受重大检验,因此没有概念验证( proof-of-concept):<sup>②</sup>不经质疑就相信全球经济服从于“高度聚合的指挥”这一假定,看上去和相信燃素说和污浊空气论一样不严谨。

不过,在摒弃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与控制”这一理念之前,我们先来检视 Taylor 与众多合作者们研究。他们延续了新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习惯,以某种方式假定公司通过结构网络中的总部“指挥并控制”全球经济。Taylor 提出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存在和重要性,但他将理论建立在 Sassen 对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在通过重要城市“指挥”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的断言之上的意图是错误的,因为他要做的并不是搜集公司之间的数据,即单个全球城市内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公司间通过联合生产提供服务的细节,并借此弥补 Sassen 全球城市概念的实证不足;相反,他采用完全不同的策略,通过搜集商务服务公司内部的办公网络数据来试图表明全球“指挥与控制”不但分布于“世界城市网络”这一功能整体中,同时也集中于四种全球“指挥”中心。文章接下来将讨论 Taylor 的研究。笔者不得不指出,INM 受困于一个连续体谬误,并且该谬误揭示出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指挥”全球的“世界城市网络”是一个不根据前提的推理( non sequitur),事实上它并非由作为其基础的 INM 逻辑推导而来,因为根据后者的方法论,网络中所有城市的“地方性”( place-ness)都不存在了。

### 三、城市消失于结构中 ( 互联“世界城市网络”的死结)

学者们已经对 Taylor 的互联“世界城市网络”

提出了若干批判,但大多是无力的,因为他们只是在重复 Taylor 自己对于 INM 和“世界城市网络”的表述。首先,批评者(如 Nordlund 2004; Robinson 2005)指出,互联“世界城市网络”中的行动者是公司。但 Taylor 本人已经表明他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将城市具体化为行动者,所以在他的网络中,公司(“次节点”层次)被明确地当作“首要行动者”来对待“这一假定的关键是,创造流(flow)的是公司,所以塑造世界城市网络的也是它们”,“全球服务业公司是世界城市网络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执行者”。其次,批评者指责 Taylor 的互联“世界城市网络”过于经济主义( economism),将目光局限在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公司。但这正是该模型存在的理由, Taylor 声称<sup>③</sup>他立基于 Sassen 的论点,即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在“指挥”全球经济中扮演中心角色<sup>④</sup>,所以“该研究的地理尺度很大(全球性的),但着眼点很集中”<sup>⑤</sup>。第三,批评者指出 Taylor 的原始数据都是属性( attributional)数据(如参见 Nordlund 2004; Robinson 2005), Taylor 对此也心知肚明。 Taylor 并不是 Nordlund( 2004) 眼里把苹果当成橘子卖的水果贩,他从未声称拥有关于流的实际数据,只是沿袭传统的空间交互模型,通过对属性数据的测量结果描述城市间关系。第四,虽然 Neal( 2011) 从 Taylor 的 INM 中看出了结构决定论,但 Neal 关注的是决定论,而非结构(所以才会有 Liu 和 Derudder( 2012) 为 Taylor 的 INM 遭受的决定论指控,而非结构主义指控,进行辩护)。在 Taylor 的方法中,结构中的城市被简化成一个个节点( nodes),所以结构主义才是根本问题所在,很遗憾 Neal 没能看出这一点。是的,笔者认为

① Zaloom C., The Derivative World, The Hedgehog Review, 2010a.

② 在此引证一些学者有关证据断层的表述( 同样参见 Storper 1997: 第九章; Smith 2001: 第三章): ( 1) “譬如伦敦、纽约和东京的支配地位就多为断言,未得明证”( Short et al 1996: 698); ( 2) “全球城市的结构分布从概念和实证角度来看仍然存疑”( Gottdiener & Budd 2005: 41); ( 3) “即便从 Sassen 所持的后韦伯主义角度来看,将全球城市作为指挥和控制中心的概念仍然是有很大问题的”( Thrift 1993: 232); ( 4) “对全球城市的管理及指挥功能的实证支撑少之又少……我们几乎不知道管理和指挥功能是怎样实际发挥出来的,不用说,这削弱了全球城市论述的可信度”( Pamreiter 2010: 35)。

③ 参考 Robinson( 2005: 758), 她相信了 Taylor 的字面意思。

④ 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为什么后殖民主义批评者指责 Taylor 仅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城市不是服务业中心而将它们“置之不理”。譬如 Robinson( 2005: 759) 批评 Taylor “略过”了“制造业、贸易、非政府组织,以及……非正式网络”等其他形式的全球化证据,她其实犯了不相干谬误( ignoratio elenchi),因为 Taylor 并非不知道这些证据的存在,而是相比国际金融和公司服务业,这些其他形式的全球化证据在全球“指挥与控制”中被假定不扮演角色,不是支配性的网络成员,因此它们在 Taylor 的框架中并不重要( 其实 Taylor 2004a: 95-100 也曾讨论过非政府组织)。

⑤ Taylor P.J., 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 Routledge, London, 2004a: 3.

Taylor的“世界城市网络”建立在INM这一谬误的基础上<sup>①</sup>,使全球城市研究陷入困境,可既然对于INM的现有批判都没有切中要害,那要害究竟在哪呢?借用Short et al(1996)狡黠的提法,我们应该通过怎样细致的检视才能发现足以推翻互联“世界城市网络”的“肮脏的小秘密”呢?既然本文讨论的是世界/全球城市研究的中心教义“指挥与控制”的迷思,下面就让我们来审视Taylor著作(2004a)中对此的论述,并找出隐藏的漏洞。

为了弥补世界城市之间关系数据的不足(而非Sassen的全球城市内部高端生产者服务业之间关系数据的不足),Taylor(2004a)与众多学者合作,考察了与100家独立竞争性公司有关的315座城市,这些公司以六种商务服务业(会计、广告、银行/金融、保险、法律、管理咨询)之一作为主业,并在这些城市中设有假定的(参考Jones 2002; Smith 2010)<sup>②</sup>总部和分支。他相信通过计算这些数据,可以有意义地确定这些总部城市的“全球网络联通性”(global network connectivity)——即“世界城市网络中的直接动力所在”,从而找出全球经济中“指挥与控制”发生的位置。“这100家全球服务业公司的总部只存在于21座城市中,这些城市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指挥中心’”。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存在致命的缺陷。

在Taylor的INM中,100家公司服务业公司分别在315座城市(其实是313座,因为勒克瑙和平壤没有公司)设有办公机构,每家“全球性”商务服务业公司(GaWC100)都至少在15座城市设有分支,并且在亚太、西欧和北美至少各有一个分支。Taylor的INM方法论逻辑是通过计算城市(“节点”)中“全球性”服务业公司总部数量来寻找“全球指挥中心”,代入一定的权重后,Taylor将这些城市评为某个层级的全球“指挥”中心。这意味着作为Taylor实证基础的“次节点层次”(sub-nodal)数据是关于全球商务服务业公司内部网络

中总部和分支的“节点层次”位置(而非“次节点层次”的公司之间网络)。将独立的、互不关联的服务业公司总部数量相加,通过得分确定任一假定的全球“指挥”中心在城际关系网中的重要性,这种做法在逻辑上是无意义的。Taylor的方法论使得作为全球“指挥”中心的任一“节点”仅仅是容纳了若干互无联系,即各自独立的全球百大服务业公司总部的“容器”(container):“各家公司在全球尺度上的内部空间组织结构可能是等级化的,也可能不是(这取决于具体经营策略),但加在一起,就得到了一个全球城市网络”。<sup>③</sup>对于百大服务业公司之间的关系、联系和网络,Taylor并没有表现出兴趣,也未能提供相关数据——讽刺的是,正是“节点”(即城市)内部公司之间关系的证据才可能为Sassen关于商务服务业公司通过合作(“联合生产”)形成“聚合指挥”的假设提供部分实证支撑——来说明他的“指挥中心”不仅仅是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发挥“支配性联系”(connectivity-through-dominance)和“从属性联系”(connectivity-through-subordination)的假定功能,容纳各自为战的竞争性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公司的无地方性的“容器”。<sup>④</sup>

Taylor很在意他所承袭并极力推广(如Knox & Taylor 1995)的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失败在从世界城市中识别并划分出全球“指挥”中心的努力。Taylor被自己的雄心偷袭,他企图将全球经济作为“世界网络”讲述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的宏大故事,将一些城市视作不同层级(巨型Mega,大型Major,中型Medium,小型Minor),并借此观察出所谓“世界城市网络”中“指挥与控制”的等级结构。但如果将城市(“节点”)单纯视为容纳各自独立的真空中(即互相之间不存在关系/联通)的商务服务业公司的“容器”,那么任何将城市归类为“全球指挥中心”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受困于连续体

① Nordlund(2004)指出Taylor最初的INM文章(2001)缺乏理论,Taylor表示认同(2004b:298),并说他在Taylor(2004a)中只是“朝理论化方向做了一些初步尝试”。换言之,Taylor后来关于“世界城市网络”的一切结果、演示、分析、结论都是围绕着INM这个中心的。

② Jones(2002)揭示了跨国服务业公司中“全球管理”的迷思,相似地,Smith(2010)通过对在新加坡或通过新加坡开展业务的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的访谈,揭示出世界上最大的一些跨国律师事务所并不像Taylor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所称,通过总部、区域总部、分公司这样的分层逻辑来组织内部的跨国办公网络和商务活动(Taylor 2004a:66-7,90)。

③ Taylor P.J., 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 Routledge, London, 2004a: 70.

④ Taylor P.J., 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 Routledge, London, 2004a: 68.

谬误(sorites paradox)<sup>①</sup> ,并暴露出 INM 及其“世界城市网络”中更根本性的缺陷。

由于任何对于城市级别的划分都建立在单一公司整体办公网络中总部“节点”的位置上,所以“世界城市网络”中存在全球“指挥”中心等级体系这一论断并不成立,这一难以忽视的真相是 Taylor 必须面对的。从逻辑上说,单凭一个总部的存在是没有界定“全球指挥中心”的效果的,因为它在运营和关系上都完全独立于其他公司总部。Taylor 的数据只反映公司内部情况。笔者在此指出连续体谬误并不单纯为了批判 Taylor 愚蠢地试图以程度的不同确立类别的不同(即边际累积(+1)的效果恰恰使得明确的划分无法进行,边际掏空了一个不断扩大的深渊——Derrida 1995; Deleuze & Guattari 1987),因为 Taylor 本人也提到,他在意的并不是计数,而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打分系统对数据组进行划分:

有些公司的信息十分详细,有些则不。这个张力是通过……对服务值的六级打分系统来解决……其中两级是自动赋分:如果公司在某城市里没有业务,显然是 0 分;如果总部设在这座城市,则是 5 分。如此,需要决定分值的就只有中间四级(1、2、3、4),以反映某公司在某城市的服务值。这意味着必须为每家公司确定三条划分界限:1 和 2 之间、2 和 3 之间、3 和 4 之间。基本打分策略是假定所有设有非总部机构的城市的初始分值都是 2 分。

笔者指出连续体谬误也不是为了批判 Taylor 通过“划分边界”对数据组的分类方法在本质上是“武断”和“主观”的,因为 Taylor 已经对这一明显的批判做了反驳:

关键问题是,这一制造数据的过程本质上存在主观性,所以数据结果并不具备主体间性的关键特性。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对于同样信息的划分界限不尽相同。所用信息的性质决定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便引出一个根本问题:由其导致的数据中的不确定性是否严重到构成无法纠正的谬误?我对于这一担忧有两点回应。一,打分方式

被设计得尽量简单,以“通常为 2 分”为中心,只需划定三条界限。二,由于数据是为总量分析而设计,大量公司被列入统计,所以任何个别的差异在总量分析中很有可能被消除了。

相反,笔者是要借助连续体谬误揭露一个潜在的更深层问题:INM 和“世界城市网络”中存在一个致命错误:我们需要的是公司之间的数据,而非公司内部的数据,否则城市就被简化为无地方性的“容器”而消失在结构中。

Taylor 所犯连续体谬误(2004a)是这样的:  
10000 家总部构成全球指挥中心。

如果有 10000 家总部的城市是一个全球指挥中心,那有 9999 家的也是。

所以 9999 家总部构成全球指挥中心。

如果有 9999 家总部的城市是一个全球指挥中心,那有 9998 家的也是。

所以 9998 家总部构成全球指挥中心。

……

如果有 3 家总部的城市是一个全球指挥中心,那有 2 家的也是。

所以 2 家总部构成全球指挥中心。

如果有 2 家总部的城市是一个全球指挥中心,那有 1 家的也是。

所以 1 家总部构成全球指挥中心!

换言之,任何一家独立的服务业公司总部逻辑上都不能构成界定“全球指挥中心”的总体过程。所以,Taylor 将 21 座城市排列为巨型、大型、中型或小型“指挥”中心的做法是个谬误,因为他对全球“指挥”中心分类中所有的排名都决定于一家家独立的商务服务业公司办公“网络”中的总部位置。笔者认为因为 Taylor 的 INM 只建立在公司内部数据的基础上(即单一、独立的商务服务业公司的办公网络中假定的总部和分支的数据),所以他对全球“指挥”的分类只是幻象。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 Taylor 在 2001 年以后关于“世界城市网络”的所有研究均根据 INM 的理念进行,INM 是其服从于“指挥与控制”的元地理(meta-geographical)

① 连续体谬误的经典表述是一个看似简单但难以回答的问题:多少块石头才算是一堆石头?两三块不够;一千块又显然够了。人们对“一堆”的石头数量没有设定底线,我们虽然觉得能认出“一堆石头”,但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模糊的。连续体谬误(源于希腊语 soros,堆)突显了渐进式(little-by-little)论证方法的漏洞。



“世界城市网络”赖以存在的齿轮<sup>①</sup>。简单地说, Sassen 的全球城市概念中,城市是作为制造“高度聚合的指挥功能”的“工厂”而存在的“地方”;在 Harvey(2012)等其他聚焦城市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通过土地、租金和投机行为积累资本的资本主义被城市“修理”了;而在 Taylor 的研究中,城市不是一个“地方”:“世界城市网络”。

#### 四、超越全球城市概念

那么,我们何以更深入地批判,并明确地超越这种新马克思主义传统、全球城市概念、互联的“世界城市网络”,并最终跳出这个因假定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与控制”而停滞不前的研究领域?笔者提出,要走出这一因错误假设导致的城市研究困境,可以参考 Thrift(1993)所指的方向。Thrift 提出使用某种意义上属于“新经济社会学”(如 Mark Granovetter, Paul Dimaggio 等)一脉的研究,他首先指出这些研究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指挥与控制”辞藻构成了“非常有说服力”的挑战。笔者在此将发展 Thrift 的目标,通过论述城市“作为社会接触和叙事创新的场所、作为这个新世界不断呈现自身的地方、作为叙说故事而不是战略决策的地方”的社会和文化表现,来反驳“聚合化指挥”的理念。笔者首先将提炼出 SSF 研究成果中蕴含的一些意义,并以此同时对全球城市概念中“高度聚合化指挥”的核心假设和“世界城市网络”(Taylor 2004a; 所有他 2001 年后的合作作者)对于全球经济虽分散但仍然服从于世界范围城市网络这一功能整体中中心化的“指挥与控制”的论点提出质疑。<sup>②</sup>

行动者-网络理论坚持认为,声称是“经济性”

的行为已然具有社会-技术意义。受此启发,一些社会学者(如 Knorr Cetina et al. 2000, 2004; Knorr Cetina & Bruegger 2001, 2002a, 2002b, 2004),人类学者(如 Zaloom 2003, 2004, 2005, 2010a, 2010b)和机构研究者(如 Buena & Stark 2003, 2004, 2005)对金融公司的日常行为、表现,和地理布局进行了一些人类学 SSF 研究。如果将这些 SSF 研究明确地与 Sassen(1991)的全球城市概念和 Taylor(2004a)的互联“世界城市网络”模型并列看待,会得到什么启发?

Buena 和 Stark(2003, 2004, 2005)对纽约世贸中心内一家国际投资银行在 9·11 恐怖袭击之前与之后进行的人类学研究,详细说明了为何“商人并不是孤独的思考者,他们参与了散布于人与物之间的社会认知”。不过,对于本文的目的来说,有趣的是,他们对于通过“社会-技术网络”(Latour 1991)和“诠释的共同体”<sup>③</sup>——投行真实的商业行为方式——形成套汇交易策略的研究,如何能帮助我们质疑对于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组织形式的现存解释,并提供对于它们为何坐落于何处的替代解释。

几十年间,华尔街已经越发成为整体金融行业的代名词,因为通过一场“建立在高速网络通达性、高能运算和计量金融学的进展这三根支柱上的真正的量化革命”<sup>④</sup>,金融公司已经将运营部门分散于曼哈顿及更远的地区,目的是不再“高度聚合”<sup>⑤</sup>于曼哈顿下城或任何地方。但是,这一分散化行为无法单纯以技术决定论(即可从交易技术的改变中“读出”金融的城市地理分布)来解释。诚然,技术原因(即通过赢得“速度竞赛”获得针对

- ① Smith(2003a)建议通过行为体-网络理论推进那些关于“世界城市网络”的前 INM 研究,这样恰好可以避免城市消失于结构中的问题。
- ② 在基于 Smith 和 Doel(2011: 4)的观察做进一步讨论前,需要指出, Sassen 在对 1991 年的初版著作所做的修订(2001),以及后来的论述中,遇到了与 Taylor(2004a)相反方向的困境。Sassen 不再简单地认为全球经济受到以一座座城市为基础(即她 1991 年著作中的“城市内部/公司之间”的全球城市理论)的远程“指挥”,而是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全球城市模型,“指挥”的工作不再是“高度集中的”,而是“置于”分散的全球回路(distributed global circuits)中。考虑到 20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以网络角度理解全球化(Castells 1996)的盛行,这个改变虽然得宜,但遗憾的是有悖于她对于“指挥”何以发生的关键假设,即指挥是来自邻近且互补的专业服务业公司间的联合生产行为。
- ③ Sassen(2006: 363)曾写过“需要从技术文化方面诠释”作为一种生产形式的金融中心——“因此,金融中心更像是一个‘生产’中心,而非购物中心”——这与 Friedmann(1986: 322)将世界城市视为“信息、新闻、娱乐和其他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扩散中心”的想法很相近,但却与 SSF 研究中社会-技术意义上的“诠释的共同体”有显著区别,后者意在指出商业行为是协作性和配置性的,而非生产性和建构性的。
- ④ Buena, D. and D. Stark, The Organization of Responsiveness: Innovation and Recovery in the Trading Rooms of Lower Manhattan, Socio-Economic Review 2003, 1, 2.
- ⑤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91.

对手的竞争优势)无疑非常重要,但投行选择地点时不会仅考虑这个。Buenza和Stark(2003)正是通过坚持将技术视为社会-技术——“技术是社会的持久化”(Latour,1991)<sup>①</sup>——来考察地方的角色,才获得了众多与全球经济服从于主要城市的“指挥与控制”这一现有假设相悖的重要发现。

首先,他们提到,在投资银行中,“相邻性”(proximity)对有些公司变得至关重要,而对有些公司不再重要;是某些部门的利润来源,却是其他部门的生存威胁”(Buenza & Stark,2003)。这一复杂性仅通过外加解释,如假设相邻且互补的商务服务业公司间进行“联合生产”,无法自圆其说。因为这样只是以一个附加框架替换了现实中多方向(向心的和离心的)的力量效果,这些力量其实都在影响公司对地点的选择。其次,Buenza和Stark提到,对每家投行来说,“现代金融真正的场所并不是证交所,而是交易间(trading rooms)”。交易行为发生在每家公司内部,这些公司的空间-技术结构被设计为有助于通过新型配置(而非加入新的资源)实现创新。实际上,对任何公司来说,确保使用不同策略诠释证券(合并、指数,或顾客交易套利)的不同“办公桌”间形成“诠释的共同体”至关重要。“实时资讯越是被所有市场行为体同时获得,诠释资讯的能力就比获取资讯更能带来优势。而充满各种资讯的交易间就是进行诠释的地方。创新作为不同评估原则之间交互的产物,便产生于交易间提供的物理相邻性”。第三,由于任何公司的交易间都是“知识密集型”的,所以应以有助于营造“诠释的共同体”的方式设计,其结构必然是众多独立的创造性协作中心组成的非等级化结构,其内部结构要有利于传播情报、组织多样性、建立信任和建立横向纽带。所以,即便是交易间也并非通过“指挥链”进行集中控制的等级化组织形态。SSF研究中这个细节观察并不利于Taylor沿用自Friedmann的假设,即将臆测为等级化的跨国办公网络相加,并假装权力是由结构网络给定的。Taylor对于现代组织中存在指挥链——战略和决策在权威阶梯中自上而下流

动——的假设是来自二十世纪中期根据依附关系(dependence)所理解的组织形态,而非当代公司的情况,即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已成为投行在实际商业操作中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在地(in situ)要素。最后,作为“诠释的共同体”和“情报的传播”,金融中心的交易室具备了一种高度复杂的“地方性”,而不管假设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跨国总部在本地“联合生产”,还是从外部“指挥与控制”,都无法体现这种复杂的地方性。

相似地,Zaloom(2003;2004;2005;2010a;2010b)在对芝加哥和伦敦的交易间所做的人类学研究中也强调了这种社会-技术层面。对本文来说,有趣之处是该研究如何帮助我们质疑任何关于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和控制”的理念。Zaloom的人类学研究关注交易间里投机者(speculator)的训练(discipline)。Zaloom(2005)参考了Foucault的理论,观察投机者如何接受训练并自我训练,将金钱的非市场意义(如偿还贷款、买车等社会现实功能)剥离,排除杂念,以充分感受“市场”的脉动。“在市场空间周围筑起边界,让投机者在交易时可以磨砺并使用纯粹的经济逻辑”。投机者们训练自己抛开自我、感情和个性的能力,成为随时应对市场波动的人形机器。所以,控制并训练他们的,似乎反而是市场。交易者不停被训练和提醒,以防被自我欺骗,误以为可以用自身的计谋跑赢市场的动荡。“训练要求交易者承认市场本身是唯一的权威”。Zaloom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市场是一种事件(event)而非可以被“指挥和控制”的结构。不过,我们仍需推进Zaloom研究中对社会-技术性的关注,以获得关于事件性(eventfulness)的完整意涵。

如今,投资银行主要依靠机器、程序、算法、软件和交易方法(“黑箱交易”、“算法交易”、“机器交易”、“高频交易”),这让金融中心可以“电传操控”(fly-by-wire),市场的波动也增大了许多。<sup>②</sup>但我们要认识到,波动性(volatility)在很大程度上是“量化分析师”(Quants)通过不同算法将交易电脑化的结果,而非建立在价值(市值)基础上“量

① Latour B. Technology is Society Made Durable, In J. Law (ed.), A Sociology of Monsters: Essays on Power, Technology, and Doinatism, Routledge, London, 1991.

② 在2010年5月6日,由于纽约证交所短暂冻结,股指大跌,大约190.4亿股在同一天内被高频“交易”,超过了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交易量,此事件被称作“闪电股灾”(Flash Crash)。

化分析师使用过往的市场形态,通过股票间复杂深奥的数学关系设计出不同的签名交易(signature deals)。他们设计交易策略时不会参考隐藏债务或盈利的公司”(Zaloom 2010a: 23)。事实上,算法套利交易只需对收益负责,无需考虑与它价值本身的关系。所有这些程序、模型和软件都是不基于现实的(baseless),它们只在乎估价、定价,和某支股票的买卖价位。也就是说,算法不仅不会考虑“资本主义的特有矛盾”和1973年全球房地产市场崩溃和石油危机以来数百次“现代金融危机”<sup>①</sup>,甚至连公司做什么、有什么都不会考虑。对于“量化分析师”、公司经理和许多现代银行业者来说,只有公司股票的变动才是有(盈利)意义的。毕竟,现代银行业的获利多仰赖五花八门的算法交易策略。因此,正是那些不属于任何算法模型的,不参与通过移动资金来“凭空创造资金”(引用贝尔斯登公司的著名的自我描述)的东西,才有力量冲击并瓦解金融资本主义网络,这正是为何全球经济无法被“指挥和控制”的原因。

总之,SSF研究中对诠释的共同体和社会-技术网络的强调是一个重要进展,这促使我们认识到,也许大城市是许多世界级多国公司总部所在地(Hymer和Friedmann),或存在可能相互合作的(Sassen)商务和金融服务业的明显“集群”(Cohen),或是被跨国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公司选为总部“节点”(Taylor),但就其事实本身而言(ipso facto),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大城市就是服从“指挥与控制”的世界经济中的“组织节点”。简言之,SSF学者通过关注大城市中金融公司的运作,并将运作行为视作“被执行的”(事件)而非“被预设的”(功能),对Sassen与Taylor的研究方法和落脚点都提出了挑战。此外,笔者特别推介的Zaloom对套利行为的事件性研究,更印证了Smith和Doel(2011)的观点的重要性,即金融中心有一个方面的事件性是SSF学者没有考虑到的。金融中心是一种多样性体,它通过自身的执行、实践和规则化,被聚拢、固定,并获得持久性,这是确定的。但金融中心作为社会-技术集合体之所以能被执行,

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不属于其执行行为的“基础要素”(founding element)上(Badiou, 2006)<sup>②</sup>,即这种要素是不持久且计算不出来的。在“算法交易”中,“基础要素”是不基于现实的价值,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简单地还原金融中心的原因或条件(Zizek 2009: 386),并假定它们“指挥并控制”着全球经济。

## 五、结 论

目前,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两条路径都无法摆脱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这一假设,二者都受到了质疑。笔者已指出,Sassen的全球城市概念发展于Hymer(1972)的新马克思主义遗产,它将世界经济看作受到外部控制的结构整体。这个认知更加确认了另一个观察,即Sassen(1991)受到这一遗产的影响,在其后韦伯主义全球城市概念中加入了两个未经证实的假设:一,全球化对于某类城市的“高度聚合化指挥”有“系统性需求”;二,公司之间的互补性合作以及一座城市内部相邻的竞争性服务公司间的联合生产不仅会发生,更可以等同于“指挥”能力。其次,笔者讨论了Taylor等人的结构主义的“互联世界城市网络”,着重指出了其与Sassen(1991)的全球城市概念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其理论中没有后韦伯主义直接和互补的“联合生产”的论点,而是与Friedmann(1978; 1986)的理论类似,假定权力只是结构网络的给定效果。此外,困扰互联“世界城市网络”的连续体谬误也揭露出一个更基础性的问题,即Taylor的研究是基于公司内部的数据,这是对Taylor试图锻造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与控制”的网络的批判。最后,笔者将SSF研究中的人类学发现与Sassen(1991)和Taylor(2004a)的“指挥与控制”假设并列看待,并提出从社会-技术集合体(Smith 2003a; 2003b; Farias & Bender 2010)、实践与执行(Amin & Thrift 2004),以及事件性多样性体(Smith & Doel 2011)的角度来理解城市与经济,从而跳出全球经济受到某种(Sassen式的或Taylor式的)“指挥与控制”的理念。□

(责任编辑:杨仙丽)

① 1987年全球股灾、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1997-1998年新兴市场债务危机、互联网泡沫等。

② Badiou A., *Theoretical Writings*, Continuum, London, 2006.